

第一章：香蕉，在那個美好的年代

香蕉曾是旗山最重要的產業，1968 年，旗山種蕉面積 2 千 7 百公頃，占旗山總耕作面積的 78%，是南部最重要的香蕉集散地。



台灣香蕉的種植歷史超過 2 百年，香蕉外銷貿易始於西元 1903 年，其中最著名的產區就是高屏地區及中部的南投。

高屏溪是一條孕育高屏農業的河流，發源自玉山，流過高雄旗山、屏東高樹與里港等地，歷經無數寒暑，在溪流兩岸沖積出肥沃的田地，不少聚落在民國 50 至 60 年間留下一段輝煌的金蕉歲月。香蕉曾是旗山最重要的產業，1968 年，旗山種蕉面積 2 千 7 百公頃，占旗山總耕作面積的 78%，旗山也是南部最重要的香蕉集散地。在香蕉產業最鼎盛的時期，台灣省高雄青果合作社在旗山就設有旗一、旗二兩個辦事處，近百個集貨場林立在旗山、杉林、美濃，以及屏東高樹與里港一帶。台灣香蕉外銷市場，民國 58 年達到巔峰，替台灣賺進近 6 千萬美元的外匯，其中 75% 外銷香蕉產自溪洲，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植香蕉，因此有「溪洲人住在香蕉樹下」的說法，當年旗山分旗一、旗二兩處香蕉收購辦事處，旗二即位在溪洲地區，轄下有 35 處集貨場。。

民國 53 年旗山農會存款破億

在香蕉鼎盛時期，旗山出現不少種蕉致富的農民，當時蕉界的名人有旗山街的吳見草、吳靜、蔡風苔、鄭英、林發，溪洲的陳金豹、柯文杞、張土堆、呂沫等十人，而旅日郭泰成、第一望族吳基瑞、富農盧廷、蔡風苔等人皆被稱為『香蕉大王』，特別是白手起家的盧廷傳奇更是遠近馳名，並且名揚日本。

當時，若是吊嘎仔（汗衫）上頭沾黏香蕉乳的蕉農都不能小看，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得罪大客戶。以前金融業務單純，蕉農賺錢就存



香蕉輸日集貨盛況（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在農會，當時旗山區農會也因為香蕉產業興盛，曾創下全台灣最高存款紀錄的輝煌歷史。近年來，旗山區公所出版多本老照片集，訪談社區耆老留下許多珍貴史料，香蕉產業占據最多版面。《歲月留痕旗山風雲》口述歷史中收錄許多老照片，其中一張民國 53 年旗山農會慶祝存款破億拍攝的黑白照片，這張照片的背景最令蕉農們津津樂道。

旗山農會退休員工盧雯銳在書中回憶說，民國 53 年之前，北中南三個農會（樹林、草屯與旗山）常競爭存款量，旗山農會拜香蕉之賜，常位居首位。民國 53 年，香蕉全盛時期，恰巧也是農會成立 53 周年，當年盈餘突破台幣 1 億 5 千萬元，排名全省第一，蕉農走路有風，在各分部存款中，又以溪洲分部存款最多。



昔時豐美的香蕉即是財富的象徵（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說到旗山農會存款，相傳盧廷是種植香蕉的富農，存款占農會存戶一大半金額。有一次，盧廷去農會領錢，櫃檯小姐「有眼不識泰山」，未依先後順序作業，竟讓

盧廷在櫃台前苦等一個多小時，終於輪到的時候，盧廷氣憤難耐，當下跟櫃台人員說「我的錢全部領出來」，櫃檯小姐一查不得了，眼前這位客戶的存摺簿金額竟占全農會存款一大半，驚動農會總幹事出面賠罪了事。旗山地方人士說，盧家種很多香蕉，旗楠一路附近都是盧家的田地，現今道路兩旁多數是盧家的土地，外界稱盧廷為「香蕉廷Y」，有關於盧廷要去旗山農會「領出所有存款」的故事在旗山流傳已久，確實讓人津津樂道。

酒家與戲院林立留下繁華註解

外來人口多，娛樂事業應運而生，南洲里的大洲戲院，是在電視尚未風行前建造的，後來戲院結束營業，但戲院仍未拆除，改當倉庫使用，後人得以一窺昔日風華。地方人士回憶，大洲戲院原本是地方仕紳郭振勝興建，目地是為了充當戲院或醫院使用，可惜郭



現存的大洲戲院見證旗山繁華的歷史（徐白櫻 攝）

的兒子後來沒有考上醫學院，新建的建築就一直充當戲院，電影、布袋戲、歌仔戲、新戲與歌舞團等形態的戲劇都可使用，觀眾約可坐滿八九成，許多早期的歌星或者演藝人員會來登台。

旗山初中聯招作文題目竟是「香蕉的自述」

出身美濃的知名作家，前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很清楚的記得，在台灣香蕉外銷日本的巔峰時期，以前小孩開學要註冊的時候，種香蕉的家長，只要去蕉田裡割下一苜香蕉，送到集貨場順利外銷，

所得就足以支付一學期的學費，可見當時香蕉的價格，多麼讓人羨慕。而跟孩子讀書有關的趣聞還有另外一則，曾任教溪洲國小與旗山國小的退休教師曾芳明回憶，民國 56 年，也就是初中聯招取消的前一年，旗山地區初中聯招的考試，旗山有大洲初中與旗山初中兩所學校，當時的學生都以旗山初中當第一志願。當年的考試作文題目竟然是「香蕉的自述」，而溪洲子弟因為天天種香蕉、扛香蕉，所以在寫作的描述特別生動、有趣，分數自然不低，因此那一年溪洲子弟錄取旗山初中的人數特別多。

民國五十年代時，台灣香蕉外銷日本最高峰時期，一公斤的香蕉可以賣五至六元，而當時市面上一錢黃金才兩百元，農業耕種沒有比種香蕉更好賺的農作物。蕉農呂大汀在香蕉最賺錢的時段，民國 55 年時進入青果社工作，當時的公務員一月薪資七百五十元，青果社職員每個月領一千一百元，算是很好的待遇了。當年青果社主導香蕉外銷日本是孤行獨市，生意是穩賺的，香蕉外銷日本的市場從「吳振瑞」爆發「金碗案」以後一年不如一年，當年從 90% 的市場佔有率，節節敗退到如今的 3% 不到。

呂大汀說，台灣香蕉輸日最輝煌的時期在民國 50 年至 60 年，有「蕉神」之稱的吳振瑞擔任青果社理事主席後，憑藉他靈活手腕爭取到日本爭購台灣香蕉，開創出台灣香蕉的黃金歲月，吳振瑞有感蕉農的心血都被貿易商剝削，向中央爭取五、五制，因此香蕉種植面積大增，蕉農大賺，農村紛紛改種植香蕉，鄉村一片繁榮。不過，台灣香蕉外銷已經走下坡。香蕉要恢復到從前的盛況已經不太可能了，主要是台灣農村人口老化，種植香蕉的人口全是老農，年輕一代根本不想回鄉種香蕉。



台灣香蕉輸日，在碼頭裝貨的盛況



昔日香蕉輸日在碼頭集貨裝船的盛況（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靠香蕉賺錢蓋房子，很多人卻沒有留住

在公賣局退休的周立回憶說：「我家的香蕉田有一甲多，全部在旗山溪對岸，以前沒有溪洲大橋，香蕉用竹簍裝、草繩綁緊，採收完的香蕉要先用牛車送到溪旁，然後再送上竹排，橫渡旗山溪回到溪洲，改用牛車載去集貨場交貨，再用拖拉庫運輸出去；若溪水大時渡河很危險，有時要繞到旗山走旗山橋與旗尾橋才有辦法繳交香蕉。



周立談起香蕉，如數家珍（徐白櫻 攝）

除了上班外，我通常利用空閒時間去種香蕉，若遇上採收期，早上4點出門去田裡割香蕉，再趕8點半到公賣局上班，香蕉交給太太去集貨場交貨。「以前溪洲有土地就種香蕉，沒有種別的」，在香蕉黃金時期，每公斤約有6至10幾元的價格，一甲冬約可收入30至40萬元，好一點可以有40至50萬元。在那時候，一芎香蕉可賣100多元，當年一斗米也才幾



十塊錢，他當年一個月薪水不多，香蕉對他家中經濟有很大幫助。

周立的老家原本是土角厝，民國 64 年靠著種植香蕉賺的錢，花了 1 百萬改建為二層樓樓房，民國 84 年又花 3 百萬又在原本的農具倉庫改建一棟二樓新房子。當年香蕉價格好，市區博愛路一坪地才 200 多元，很多人種香蕉賺了錢卻又去買更多農地種香蕉，沒有去市區買到地，後來都很後悔，「很可憐，當時的錢都沒留住」，後來整個香蕉景氣崩下來，情景真的落差很大。

香蕉是勞力密集產業，50 年前就有移工

談起香蕉周立如數家珍，他說：以前種三甲地就可以申請一個埔場（集貨場），香蕉黃金時期，高雄青果合作社旗二辦事處共有 29 處集貨場，溪西有 13 場，分別為鹿、角、公、山、社、洲、平、冬、坑、形、尚、三、輝；溪東則有五、獺、八、泉、裕、廣、秀、橋、墘、雙、中、大、和、新、民、岸等 16 場。

旗山香蕉外銷的鼎盛時期，許多外地人來旗山工作，所以溪洲人口暴增，人口數最多有 6 千多人。以前在香蕉採收期需要大量人手，主要負責搬運香蕉的工作，這些人力都來自外地，要包吃住，在景氣最好的時候，旗山這裡的蕉農都會付比較高的薪水請外地工人，蕉農周立回憶，他家以前請過一個從阿蓮來的工人，不過大採收期一人不夠，須雇用 2 至 3 人才忙得過來。因為，當年溪洲居住的人口多，外地來工作的人也很多，所以街上十分熱鬧，旗山農會溪洲信用部附近、南洲里那邊有兩間茶室、還有一間戲院，旗山鎮上應該有十幾家茶室或酒家，非常熱鬧。

在周立的印象中，以前吳振瑞常到溪洲，他曾經跟其他蕉農代表與他一起在餐廳吃過飯，所以對吳振瑞印象很深刻，覺得他真的很有能力，跟日本人做生意很講求信用。

一甲地香蕉年收入 20 萬，公務員月薪只有 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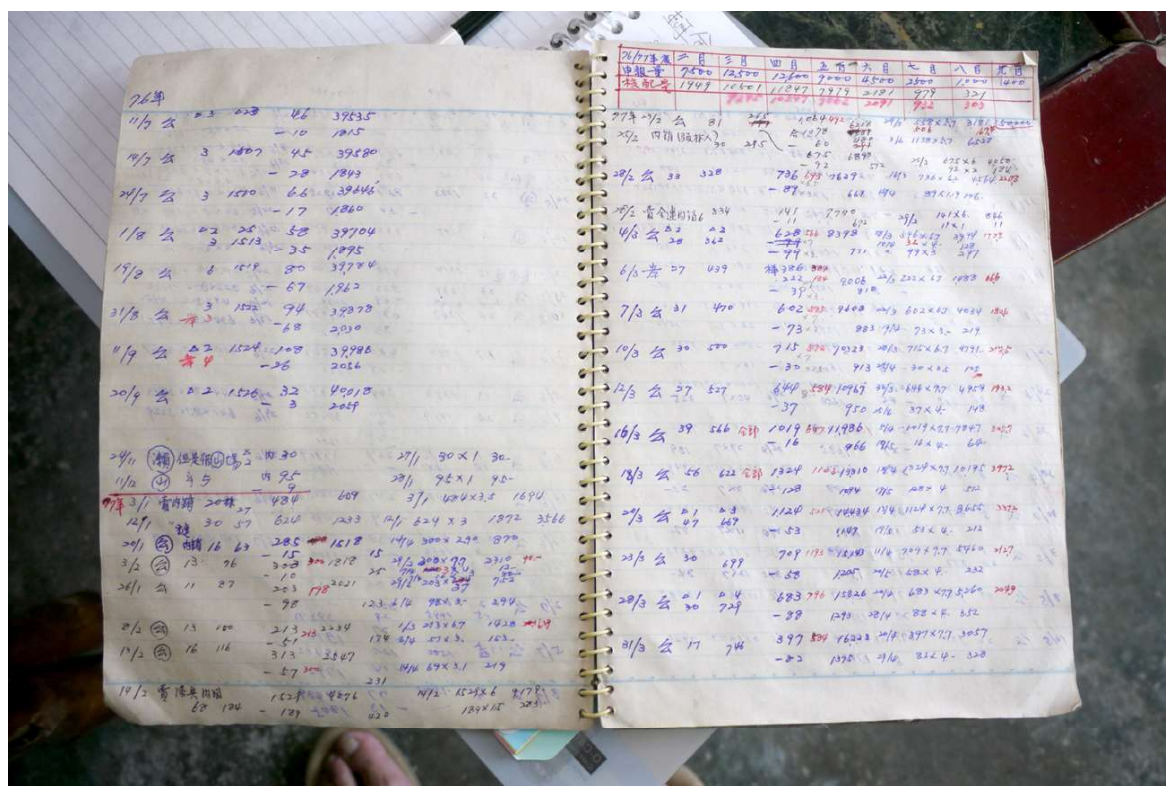
今年 94 歲的旗山蕉農柯金吉，年輕的時候幫人做工，家裡沒有農地，在民國 40 年左右，努力存錢買地才開始種香蕉。剛開始種香



柯金吉靠香蕉蓋了自己的房子（徐白櫻 攝）

蕉是從 50 棵種起，那時香蕉苗很貴，他總共花了 400 元，像是在照顧寶貝一樣照顧香蕉，隔年增加到 150 棵，第三年到 500 棵，民國 52 年時最多種到 1 萬棵。當時一分地可種 180 棵香蕉，後來又租了約 1 公頃左右的河川地種香蕉，「這樣賺、那樣賺，香蕉幫我賺很多錢」。印象中，每公斤香蕉至少都有 6 塊錢左右。

柯金吉說，早期台灣香蕉外銷日本全由台



柯金吉保存的老帳本（徐白櫻 攝）

灣青果輸出公會負責，那時陳查某當會長，每年都來買 20 萬籠香蕉，多出來的就不買了，所以其他香蕉就會滯銷，他說「我多買也是賺這些錢，不願意多買」。而吳振瑞有感蕉農的心血都被貿易商剝削，向中央爭取「五五制」，因此香蕉種植面積大增，蕉農大賺，農村紛紛改種植香蕉，鄉村一片繁榮。當年台灣香蕉的銷路變得很好，沒有滯銷，大家很高興，不用再看青果輸出公會的臉色。

柯金吉至今都還保留著一本當年的帳冊，裡面記錄當年販售香蕉的內外銷價錢，他說，在當年汽油一公升才 4 元，男工一天 20 元、女工一天 10 元，種一甲地香蕉一年約可收入 20 萬元，公務人員一個月薪水只有 500 元，他家原本是住破草厝，為了蓋房子努力種香蕉。民國 52 年的時候最多種了 1 萬棵香蕉，那時候香蕉價錢好，那

年香蕉收一收剛好可以蓋房子，他的房子自己設計，自己運砂與石頭，大約花了十幾萬元就蓋好了，現在住的房子都是靠種香蕉賺來的。

巡視香蕉園就像在閱兵，快樂難以形容

香蕉對他而言就是生命的重心，他很用心種香蕉，所以香蕉品質一直很好，他自誇他的蕉園跟別人不一樣，每畦都很直、很整齊，他很用心觀察香蕉的情況，若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跑去香蕉園看香蕉。他說：「心情若壞，去園裡巡一下就會變好，鬱卒就消除了，



柯金吉年輕時在蕉園留下的照片（柯金吉提供）



柯金吉與香蕉合影（徐白櫻 攝）

感覺自己就像是總司令在閱兵，幾千人（香蕉）在我面前迎接我，這種快樂很難形容。照顧香蕉很簡單，只要用心關心就會給我們回饋，所以我跟香蕉的感情很深」。

他也回憶以前種香蕉需要很多工人，溪洲的工錢卡好賺，所以街上很熱鬧，很多外地人都來這裡賺錢，人若多，娛樂界就跑出來，所以茶室生意很好。但他因為以前窮怕了，去茶室要花桌面費、服務費與小姐出場費，「會驚」一次要花好幾千元，這個錢要賺很久才有，所以他很少去，只有在朋友聚餐、朋友當兵餞別時會參加，但參加到一半就會溜回家了。

「我種 50 年的香蕉，很有成就感」在柯金吉的印象中，民國 40 至 60 年這 20 冬是香蕉最好的時期，民國 60 年以後開始走下坡，

我遇過最好的時候，也有遇過最差的時候。吳振瑞出事那年，柯金吉也去參加蕉農表揚。他回憶說，有一年社員大會在高雄的華僑大戲院舉辦，吳振瑞在頒獎之後送金碗、金筷子、金湯匙與金盤子給大家，當年印象很深刻。不過，在吳振瑞的「金碗案」之後那幾年就很淒慘，整個香蕉產業崩下來。當時蕉農很傷心，了（虧）很多錢，蕉農都很懷念吳振瑞。柯金吉一直種香蕉種到民國 95 年才結束，那時為了中風老婆的健康，才決定改種對她身體有益的作物，一甲農地全部改種有機芝麻，不再種香蕉了。老農夫對香蕉充滿著濃濃的感情，也對那段香蕉的黃金歲月，懷著滿滿的思念。

南投蕉農之女最美好的回憶

而在中部南投香蕉產地的情景也是如此，退休的國中國文老師饒鳳珠對於香蕉有著甜美的回憶，饒鳳珠的父親饒騰麟是南投的蕉農，也是當年台中青果合作社的監事，她是在香蕉產業沒落之後，民國 60 年時為了求學才舉家遷至高雄的。在她的記憶中香蕉活絡了很多的家庭，印象中，小時候集集、水里等地的交通、鐵路都很好，她跟著大人去水里買米、飼料或紅綢等上等衣物，要一人或兩人包一台小貨車載回信義鄉，要載進入中興國小裡面，若有過不去的山溝，兩個大人要下來推貨物，小孩要坐在貨物（米）上，以前都要買很大袋回去分裝，因為很多人搶著要。

饒鳳珠回憶說，小時候我們住山上，香蕉要一擔一擔地挑下山去集散場選別（汰選品質），在集散場裡面，籬筐排好以後，一戶戶要放在大的地板上，按照上等的、中等的分開裝箱，當時裝香蕉



香蕉是饒鳳珠童年最美的回憶（黃旭初 攝）

的容器是竹簍筐（類似現在裝高麗菜的竹簍），須要有技巧擺好，用布袋針縫好，9 點半或 10 點左右就要全部作業完畢，被打下來的香蕉要挑回家餵豬，雖不能賣卻也是好東西。她說，香蕉整株都是寶，香蕉籜（莖）可以當養雞養鵝的飼料，葉子可以拿來當雨衣，曬乾可以包豆腐或作粿和菜包。

一邊挑米一邊挑錢，唱歌回家的美麗風景

饒鳳珠說，香蕉裝箱之前要上膠保存好，這樣才能在 21 天後到日本時剛剛好（熟），這些作業每天都很有程序在進行，有會計、有



饒鳳珠最愛的一張早期的五元鈔票

磅秤小姐，一個禮拜結算一次帳給我們；她跟著爸爸到集貨場內發現，還有場長、技師，給予種不好的人技術指導，或者工程類的技師顧問，當時她才只有5、6歲，爸爸會帶她去集貨場，因為她不會吵，只會在會議室外等待，等多久都沒關係，「我都在那邊觀察，小時候，我一直在想何時才能長大，能像爸爸那樣，坐在有紅布條的辦公桌前面，那種感覺很光榮、很神氣」。

「我喜歡在香蕉市場裡面串門子，四處玩耍，然後等待最美好的時刻到來，因為一擔香蕉挑出來，回去的時候，大人們的擔子一邊挑米和日用百貨，一邊則挑著一捆捆的錢，跟著大人在回家的路上唱著歌，那是最快樂的時光，也是最美麗的風景」，可見當時種香蕉的收入多麼豐盛。饒鳳珠談起香蕉時，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在那個美好的年代，香蕉不僅豐足了農家，也給小女孩的人生寫下最甜美的回憶。



領倒農會的蕉王，「芎蕉廷仔」的傳奇

台灣香蕉輸日的傳奇人物，除了吳振瑞外，在旗山地區還有另一個香蕉大王「芎蕉廷仔」。「芎蕉廷仔」本名盧廷，生於 1895 年，三歲喪父，長兄夭折，與二哥盧邦自幼失學，兩兄弟由寡母含辛茹苦撫育，平日常靠撿蕃薯採野菜拾荒度日。廷仔十三歲時進入旗尾糖業株式會社當工友，手腳伶俐又肯學，老實誠懇，頗得上司器重，教他識字，幾年後廷仔已能說一口流利日語，並看懂日文報紙，讓他瞭解一些社會新聞與國際大事，種



盧廷

下日後能與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為國家賺取巨額外匯的契機。

盧廷約十歲時，因欲賒鹹魚卻因貧窮受店家拒絕；十八歲時，鄰居為他做媒，對方嫌他無田無地，拒絕婚事。在這兩次被人看輕的慘痛經驗中，盧廷下定決心存錢買地打拼。後來他將勤奮賺來的錢，以四百元買下他家對面的一甲田地，首度成為「地主」。他將田地一半種植水稻，一半種香蕉，從此與香蕉結下不解之緣。開始只是將自種的香蕉自燻自售，後來漸漸成為香蕉的盤商，「芎蕉廷仔」的名號不脛而走。

此後他不但將自有田地完全改植香蕉，並一甲一甲買下鄰近土地，廣植香蕉，香蕉買賣生意越做越大，日本商社亦慕名而來，與他交易。在旗山香蕉全盛時期，他種植的香蕉多達十餘萬株，以一甲種一千八百株計算，他的蕉園就有近百甲，封他為「香蕉大王」毫不為過。

有一次盧廷去農會提款，一生節儉的廷仔，照舊穿著沾滿黑污香蕉樹汁的「香蕉衫」，頭戴草笠的庄腳人打扮，小姐一時怠慢，讓他等

了一個多小時，盧廷憤而說：「把錢全部領出來。」小姐此時一驚，才知他是大金主，旗山農會大半存款都是他的，如果一次領光，農會馬上倒閉。小姐猛陪不是，並請出總幹事來做「危機處理」。總幹事一見是「芎蕉廷仔」，揚言要把小姐撤職，以平盧廷的氣。不過為人寬厚的盧廷，反而為小姐求情而保住了她的飯碗。這就是「一人提款倒農會」的故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盧廷之子盧中義曾擔任過兩屆的高雄縣議員

日本商社因其名氣響亮，有一次，特地邀請台灣香蕉商人去東京開會旅遊。開會場面很大，大會特別安排這位台灣的香蕉大王坐在最中央的「大位」，並請他上台講話，盧廷因從未見過如此大的場面，惟恐講話不得體，只拿起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R，並在外面加個圓圈，然後向來賓行個禮。日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代表他的香蕉品牌保證的標誌，立即給予如雷掌聲，可見「芎蕉廷仔」在日本商社地位的崇高。

盧廷因香蕉致富後，努力栽培孩子，其子盧中義曾擔任過兩屆的高雄縣議員，「金蕉廷仔」的故事，也堪稱是旗山的勵志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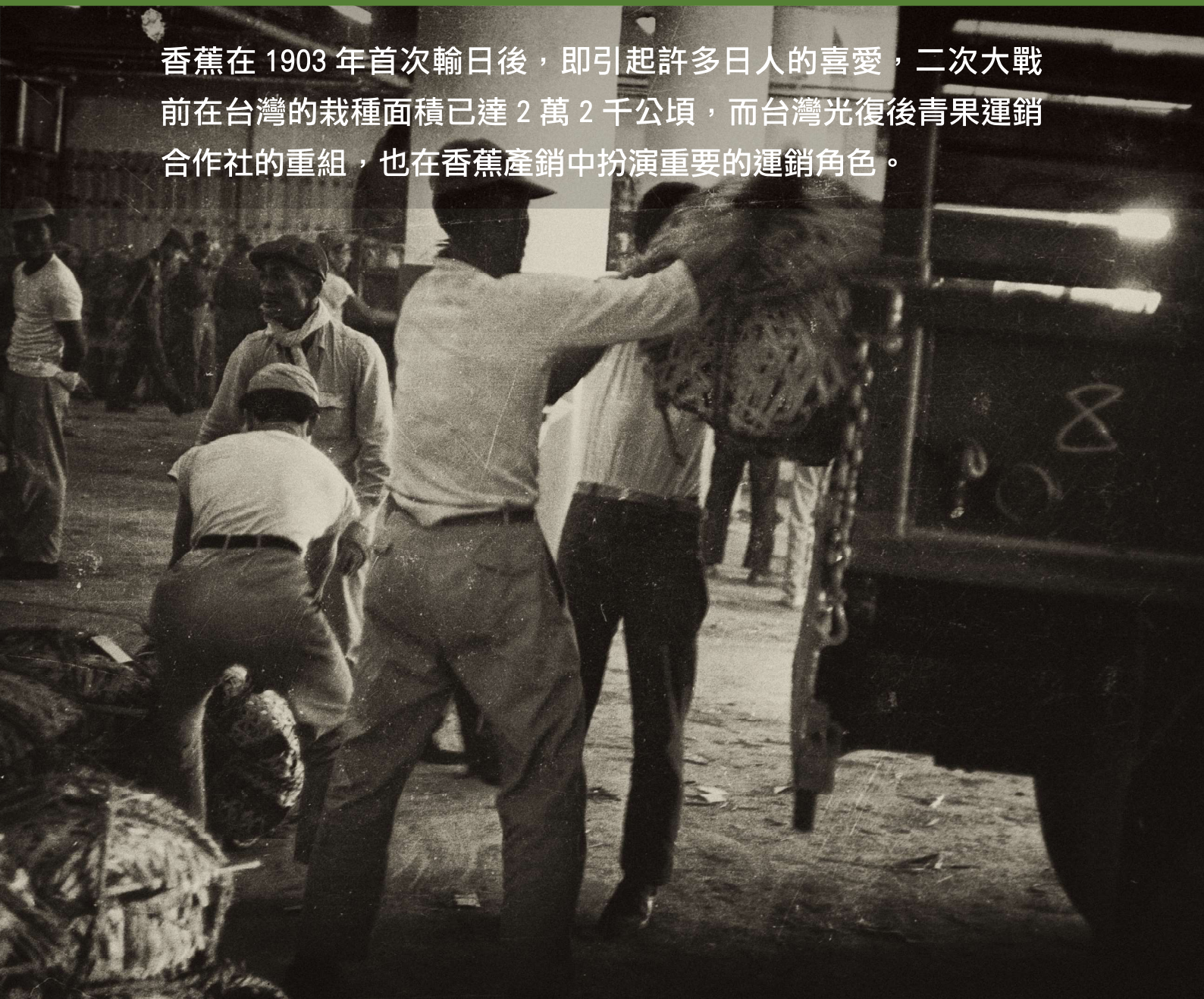
（取材自網站：旗山奇 六月撰文）

本章參考資料：

- 《歲月留痕·旗山風雲—耆老口述歷史》，劉己玄採訪撰稿，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出版。
- 《時空蕉會 旗蹟重現—旗山老照片故事集》，劉己玄撰文/主編，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出版。
- 《感今懷昔 旗山照片集》，劉己玄·鍾聰美著，高雄市旗山區湄鼓社區發展協會出版。
- 《山城包娜娜：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莊淑姿著，麗文文化出版。

第二章：潮起潮落， 台灣香蕉輸日興衰的故事

香蕉在 1903 年首次輸日後，即引起許多日人的喜愛，二次大戰前在台灣的栽種面積已達 2 萬 2 千公頃，而台灣光復後青果運銷合作社的重組，也在香蕉產銷中扮演重要的運銷角色。



潮起潮落，台灣香蕉輸日興衰的故事

香蕉是台灣常見的熱帶水果，細數台灣香蕉的輸入與栽培約有二百餘年歷史，但口感綿密的香蕉從農家附屬作物，到擴大種植面積，成為重要經濟作物及貿易商品約莫始於 1903 年（明治 36 年）首次輸往日本。爾後，種植香蕉利益提高，引起農民栽種之興趣，香蕉之生產及產值不斷增加，到了二次大戰前，香蕉產值已成為僅次於米、砂糖、茶、甘薯作物。

香蕉之所以成為重要經濟作物，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地處寒帶，氣候與地跨熱帶和亞熱帶的台灣不同，而日人尤其喜愛香蕉、芒果、鳳梨等熱帶水果。因此香蕉在 1903 年首次輸日後，即引起許多日人的喜愛，促成台灣香蕉長期輸往日本的農業貿易契機，更是台灣首





樣重要國際貿易商品，二次大戰前在台灣種植面積在最高紀錄栽種面積已達 2 萬 2 千公頃，年產近 22 萬公噸，而日本更掌握統籌香蕉貿易通路。

二次大戰期間直到戰後，香蕉生產也受到外銷情況的波及，特別是戰後香蕉輸出陷入停頓，但在過渡的三、四年間，大陸一度成為台蕉輸出的主要市場，但也隨著國共戰爭情勢升高，國民政府又失守大陸疆土，撤退來台，大陸市場也跟著停滯。在此同時台日貿易隨著戰爭的腳步遠離，慢慢恢復貿易互動，自民國 39 年七月，簽訂中日貿易協定，台蕉輸日交易制度幾經變革，中日買賣雙方業為爭取各自的利益引起的爭議高潮迭起。

1963 年 4 月，日本實施香蕉輸入自由化，台灣香蕉輸日數量又



台灣香蕉輸日在碼頭裝船盛況（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大幅提升，再次引起農民栽種香蕉之興趣。迄 1970 年止，生產面積一度增至 4 萬公頃，蕉農多達 12 萬餘戶，從事香蕉生產的人口估計達 60 餘萬人，其他從事香蕉之集貨、包裝、運輸等人員之數目，也在 10 萬人以上。學者林英毅以此估算，香蕉產業人口總計有 70 餘萬人之多（林英毅，1972），因此香蕉產業之興衰，牽繫著許多人的生計，香蕉產業發展的過程更是台灣農業發展史的重要一頁。

其中 1969 年因國內政府因素干擾農業貿易，發生俗稱「剝蕉案」事件後，造成台日香蕉貿易的信任瓦解，而使日本香蕉市場由台灣獨占的情況急轉直下，中南美洲和菲律賓香蕉成功輸日，繼而演變成三國香蕉相互競爭的情況，在諸多因素作用下，台灣香蕉逐漸失



台蕉輸日曾經創下每年賺取 6000 萬美元記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去日本市場，輸日數量衰退。

台灣光復 從青果組合到青果合作社

因著歷史和地緣的關係，台灣香蕉的外銷，一向以日本為主要輸出市場。民國 34 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所有日據時期成立的社團及民間組織，青果組合、農會等也在政府一聲令下，重新改組，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的青果同業組合及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等鳳梨同業組合，均依法改組為青果運銷合作社。青果運銷合作社的重組、整併再出發，在未來的香蕉產銷中扮演重要的運銷角色。



民國 36 年四月二十一日，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成立，首任理事主席林綿順，主要業務為香蕉、鳳梨運銷；而由新竹、台中縣、高雄青果合作社及台北縣合作社聯合社、台南縣合作社聯合社及申請成立中之台北市青果合作社等六單位共同籌組的「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也於 36 年六月十四日成立，首任理事主席由當時任台灣省農會理事長的殷占魁出任。

民國 49 年二月及五月，台南縣、台東縣兩合作社併入當時的「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並易名為「台灣省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這個囊括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台南市、台南縣等六縣、市的青果運銷合作社，也就成為全省規模最大的合作社。到此，台灣省青果合作社的分佈'已成為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四個超縣級單



昔日香蕉輸日，皆以竹籠裝運（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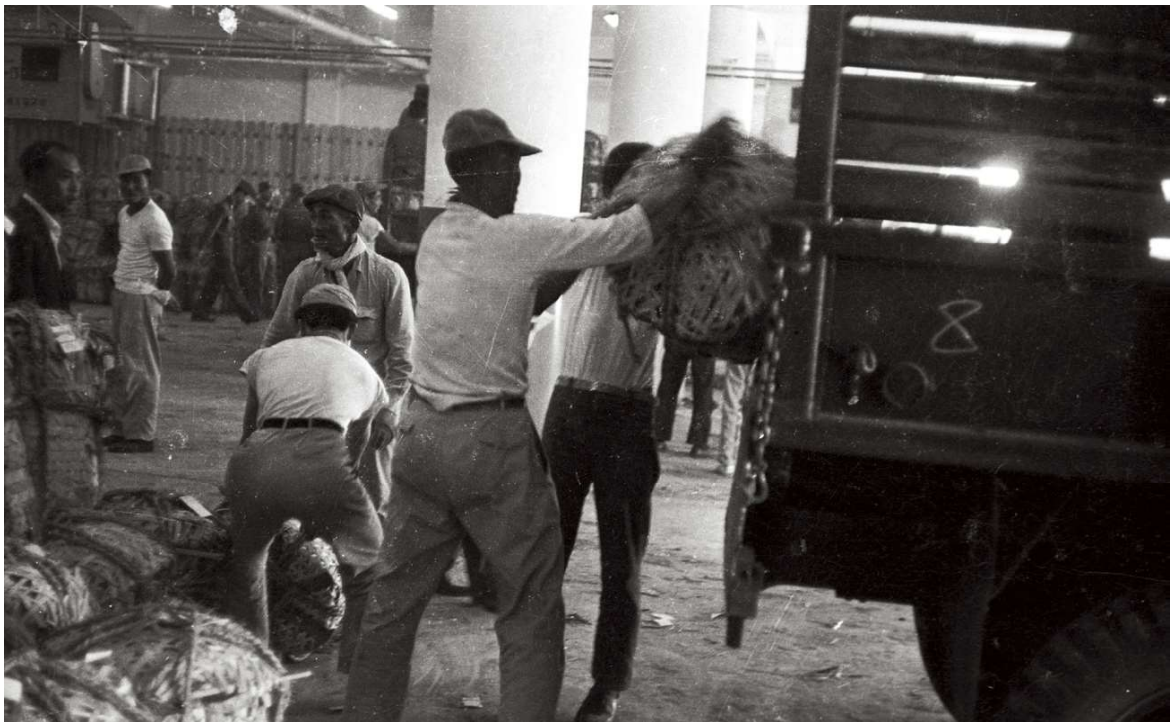


位社及宜蘭縣、花蓮縣兩個縣級單位社及一個聯合社的組織。

重新開發輸日香蕉市場

台灣香蕉的興衰與日本市場交易息息相關。民國卅四年(1945年)，戰後的日本香蕉進口一時斷絕，民國卅八年隨著大陸市場的停滯，青果合作社推動外銷業務又趨於沈寂，業界以開拓日本市場為唯一的希望。同年四月，青果聯合社理事主席殷占魁辭任，台中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陳反上任後旋即赴日遊說，重新開啟停頓多年的台蕉輸日，各商社都希望大量輸入香蕉恢復過去的舊觀。

當時的台日香蕉交易，是由駐日盟軍直接採購，故其數量有限。如大量輸日，須由日本政府開放民間貿易。故向盟軍總部、日本通



把香蕉裝運出去，把鈔票賺回來。(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舊時的高雄青果合作社

產者、大藏省等交涉，終於獲得盟軍總部及日本政府同意，於卅九年四月開放民間貿易，將香蕉列入中日易貨貿易項間，並初步獲得以貨換貨之交易方式，重啟台蕉輸日的管道。

同年7月中日簽訂貿易協定。日方公告每期台蕉進口外匯數量，自業者按分配外匯開購蕉信用狀來台並按信用狀到達先後登記次序出口，就在台蕉輸日出現曙光之際，青果商人於是崛起，紛紛設法爭銷日本，為避免同業競爭而組成「台灣區青果輸出同業公會」。

在政府對於香蕉出口的放任態度下，辦理共同運銷的青果聯合合作社與青果商人間陷入長期競爭，而形成在內搶佔外銷配額，在外競爭的不良情形。



長期對抗

青果合作社聯合會 VS 青果輸出同業公會

早期台灣香蕉銷到日本，在我國方面要經過兩重關卡，第一、青果合作社先與青果公會在「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議定船隻調度、裝運數量及議價，才能使台蕉順利出關，第二、通過聯委會之協議後，還要聯合青果公會與日本進口團體進行談判香蕉銷售方式規格、數量、價格以及信用狀的開發、裝卸、載運等等繁雜事項，俟談妥後才可以簽訂合約進行交易。這些交易，都直接或間接關係著生產者、貿易商、加工業者與消費大眾的福祉，其中也包括了國家政策與貿易制度，因此，產銷方式便成為雙方爭議的問題。

為解決此現象，保障蕉農利益，民國 39 年 (1950 年) 10 月台灣省政府公布「台灣青果聯合運銷辦法」規定生產團體與青果商之合作出口。並組設「台灣青果產銷聯營委員會，由省農會、省青果聯合社及青果商公會各派三名委員聯合組成，辦理香蕉配船、議價事務；其合作方式為生產團體以香蕉產地價格為投資，青果商以運銷費為投資，出口所得扣除雙方的投資後，其餘按投資比例分攤 (戴德芳，1987)。然而合作出口的執行有名無實，各青果團體與青果商間依舊相互競爭，且因青果商掌握較多貿易資源，香蕉出口仍操於青果商之手為多。

試行「二五制」蕉農樂透

在青果合作社團體積極爭取下，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於民國 45

年（1956 年）訂定「處理輸日香蕉臨時緊急措施事項」，仍按聯營出口原則辦理，但出口配率方面的規定為產銷團體雙方出口比率為：青果社為百分 25，青果商為百分之 75 此即所謂「二五制」。但此緊急措施只施行一年，至民國 46 年 9 月期滿又恢復原來的措施，直至民國 52 年為止。由於在臺的青果輸出商，有許多也是日本的輸入商，



昔日的高雄青果合作社現在已改建為大樓

在其互相聯合之下，日本每年購蕉信用狀 90% 操控在出口商手中，故蕉貿市場價格雖高，利潤多為青果商所得，蕉農所得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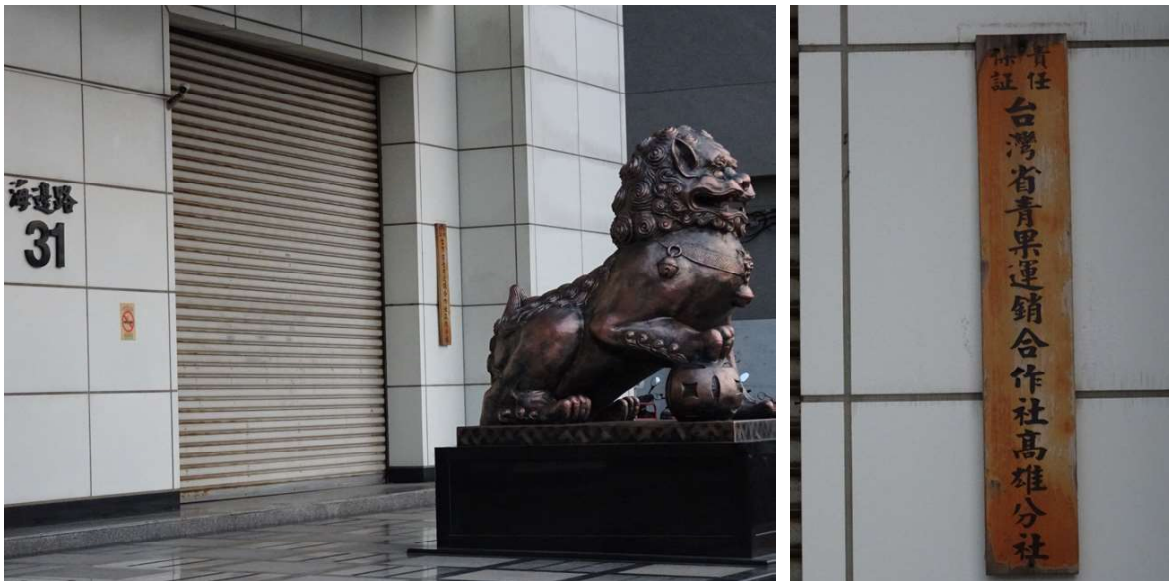
青果商於國內組織「青果輸出公會」，由公會向合作社購買香蕉，形成了買主只有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台用低價向生產者購買香蕉，因此台灣香蕉雖賺錢，但其利益多為青果商所得，蕉農未蒙其利。青果合作社為抵制商人組織，民國 40 年（1951 年）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在日本東京都開設「東京辦事處」，於民



國 46 年 9 月在辦事處址與留日華僑合資設立「光南物產株式會社」爭取業務，但最後仍以華裔股東退股及業務糾紛收場，青果商及公會仍獨佔鰲頭。

然而辦理共同運銷的青果合作社聯合社在試辦「二五制」的短短一年當中，自行外銷之利益還能分還分紅給社員 60 幾萬元，也讓社會得以了解青果商與合作社兩相爭執下，青果合作社確是造福蕉農之組織。因此如何免除青果商的控制，增加自辦出口量，以提高並保障蕉農社員之收益，已是全省蕉農的共識與訴求。

自民國 39 年七月，中日貿易協定簽訂以來十年。台蕉輸日交易制度幾經變革，中日買賣雙方業為爭取各自的利益引起的爭議高潮迭起。而長久以來青果社與青果商在產銷競爭下，青果社資金較少，無法支付回扣給相關官商，爭取信用狀的能力比不上青果商，或在日華裔以權利金購買進口配額，或與日商勾結，使信用狀直接開給華商在台公司，因此競爭過程合作社仍長期居於下風。



現在的高雄青果合作社

在這一場以蕉農為主體的青果合作社與青果商組成的青果同業公會的長期戰爭中，青果商最懼怕的事實，是他們始終無法辯護在利益攤還這一點上，面對蕉農他們無法比青果合作社做得更好。但他們更懼怕青果合作社繼續努力爭取「產銷一元化」的行動，因此彼此攻防不斷，於是台中青果社在災害連年當中，又出現人謀不臧的指控，爭訟連年。這種情形一直到民國 52 年（1963 年）日本政府宣告香蕉進口自由化以後，青果合作社取得百分四十五的輸日比例而大翻身，但青果商與蕉農合作社的紛擾，卻悄悄進入政治惡鬥角力的棋局當中，以潛伏之姿蓄勢待發。

日本香蕉進口自由化 五五出口時期 (1963-1973)

民國 52 年日方開始蘊釀香蕉進口自由化，對香蕉進口數最較為寬鬆政策，台蕉生產不敷日方需求，促使日方轉向厄瓜多爾購買香蕉做為彌補。1962 年（民國 51 年）7 月底，國內發生副霍亂，日本立即禁止進口台灣香蕉，期間達三個月，日方便轉向厄爾瓜多進口香蕉，使得厄蕉在該年占有日本市場 40%。但厄蕉大量進入日本市場不久，即受到風味不佳的批評，故其價格與評價都無法與台蕉相較。但日本業者已向中南美洲開闢了進口路線，對於日後台蕉在日本市場的發展埋下未來競爭者的種子。

台灣則是趁日本宣布開放香蕉進口自由化的時機，由青果社聯合社發動以高雄社為主之陳情運動，先託地方議會提案，向省議會陳情，並發起各地方的蕉農代表組隊，乘宣傳車到台北向政府有關



機關及立法院訴願（吳振瑞，1989）。當時青果社的爭取運動獲得專家學者與民意代表、機關及社會輿論的支持，此種壓倒之優勢，幾乎敲碎了青果出口商維持既得利益之夢想。但青果公會仍展現雄厚實力，力圖維持現狀，在雙方的角力下，政府終於 52 年四月十六日（1963 年）公佈「改善外銷香蕉計價暨有關事項臨時辦法」規定限制利潤，增加蕉農收益，及「輸出香蕉聯合配運辦法」規定出口比例由本省的生產社團（其中青果運銷聯合社承辦 45%、省農會承辦 5%）及青果出口商各占二分之一，這即所謂「五五制」。「五五制」的上路促成日方建立香蕉催熟工廠；因此台蕉增產迅速，香蕉的生產和外銷在短期內就增加了九倍之多，每年已達六千萬美元，不但在外銷農產品中佔第一位，同時在整個出口貿易中也佔第一、二位。

青果合作社擴充的黃金年代

「五五制」實施後，合作社雖然未爭到自產自銷的全部權利，但僅百分之四十五之出口權，已為合作社帶前所未有的業務旺盛，「外銷香蕉計價辦法」大幅度提高了蕉農產地價格。也使中南部地區農村經濟出現繁榮景象。高雄港每天約有三百台卡車，大排長龍為之壅塞。

隨著香蕉輸日的暢旺，台灣的香蕉外銷終於達到日治時期數量的兩倍——七百萬籠以上。民國 54 年，蕉農的每籠所得更攀升至兩百零三元之譜，讓蕉農年收入可達二十萬元以上，對照彼時一般公務員五百元月薪，足見香蕉出口所創造的財富與利益。由於業務大幅擴展，合作社組織及編制也隨之擴大，青果合作社主席、理事、

監事和代表等也頗受蕉農愛戴。香蕉銷日成就的背後推手，正是被蕉農稱之為「蕉神」或「香蕉大王」的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的吳振瑞。

在吳振瑞的主導下，台日之間在雙方都能獲利下有了良好的合作默契，是以台灣香蕉產業得以在生產者與青果商之相互競爭下，雖偶有衝突，仍能持續發展。台灣亦在此時得到「香蕉王國」之美譽，僅高雄一社，產地辦事處擴展至十五個，並在各辦事處建設大型包裝材料貯存倉庫二十八棟，三〇一處集貨場，並附設倉庫。包括臨時人員在內達一千五百餘人之多人。台中社當時也有三百多人，各地分設九個辦事處，各地青果合作社業績大幅成長，不但為國家賺取大量外匯，也為蕉農帶來不少財富。當時的青果運銷合作社賺了不少錢，人人稱在青果社職員為捧「金飯碗」。

剝蕉案砸爛青果社金字招牌

在業務一片欣欣向榮當中，五十六年十二月，高雄青果合作社利用慶祝合作社成立廿年週年紀念，為酬謝各有關機關對過去合作社之支援及進一步爭取合作社自產自銷，不惜以巨額經費購入「金杯」、「金碗」等貴重財物餽贈有關人員，引起各方注目。

民國 58 年 3 月 7 日這一天，司法機關對合作社採取強烈措施，查封高雄青果合作社所有帳簿及重要資料，並逮捕合作社理事主席吳振瑞、經理、主管及部份理、監事等，使合作社一時群龍無首，人心惶惶，陷入混亂不安的狀態，接著部份政府有關人員也遭魚池之殃相繼入獄，台中青果社不久也同受達伐，一時全省青果運銷合



作社鬧得風聲鶴唳，舉國嘩然，不但震撼全台灣，也傳到東南亞，輿論沸沸揚揚，青果合作社「金字招牌」也黯然無光。

此一事件在當時被國民政府打造為青果社剝銷蕉農獲利之表象，將此事件稱為「剝蕉案」。「剝蕉案」導致吳振瑞這位串起台日貿易的中介靈魂人物垮台，某種程度也意味著台日香蕉貿易中的信任紐帶隨之嘎然而斷。同年夏天，台蕉便兵敗如山倒地從日本市場敗退下來。

「剝蕉案」發生之際，正值高、屏地區香蕉盛產期間，外銷業務迫在眉睫，而合作社重要幹部則多遭逮捕，眼看出口作業將受延誤，同月中旬台灣香蕉貿易即一敗塗地，3月19日台蕉業務會議於台北舉行，原雙方已於會議前談妥的蕉價每籠7美元被殺為6元4角(美元)，數量亦被削減到所預估產量之七成以下，計算國家外匯損失超過1千7百萬美元(吳振瑞，1989)。爾後青果社與日方的良好合作默契，因剝蕉案的發生，而大受打擊，報紙對日方商人來臺行徑的過度渲染，使日方商人對青果社保持距離；另一方面部分和吳振瑞有長期良好貿易互動的日本人，也對於國民政府以人治方式介入台日香蕉貿易，以政治迫害方式介入青果社相關幹部的方式相當不滿，因而在後續的台日香蕉貿易上以強勢作為表達其不滿(吳庭光，1989)。台灣香蕉貿易因剝蕉案而大受打擊，多年來好不容易培養的雙方合作信任關係，一夕之間破壞無遺。

台蕉輸日大逆轉

「剝蕉案」之前已有日方財團和美國資本家在菲律賓進行香蕉

的種植，於是趁機大舉進軍日本香蕉市場，連帶使台灣丟失在日本打下的市場佔有率，代之以中、菲、南美三足鼎立的劇烈競爭局面，對台蕉輸日發展造成難以回復的負向衝擊。1970 年至 1973 年間，日本自台蕉獨占市場而轉變為台蕉、中南美洲蕉及菲蕉相互角逐、競爭激烈的國際香蕉市場；由於菲蕉是由美日兩國大企業挾雄厚資金與市場經營經驗，以菲律賓為基地，直接生產並供銷日本市場，台蕉則囿於小農制度、生產成本偏高且品質管制工作無法徹底有效執行等因素，導致香蕉輸日漸趨劣勢。1973 年時外銷數減為 1 千 5 百餘萬箱，僅及輸出巔峰時期的 60% 而已。從 1969 年菲蕉大量銷往日本，1970 年厄瓜多爾香蕉銷入日本比率首度超越台蕉，佔 55.53%，該年台蕉僅占日本市場的 25.32%，這是台蕉首次未佔日本市場的 50% 以上，之後也再未超過此一比率了。

在日本輸入方面，1971 年 7 月改行標售制，而免受日本香蕉輸入組合規約的限制，但這種方式對於台灣生產之安定性及日本輸入業者之市場經營均有不良影響；而且日本商社亦於 1974 年 2 月間發生聯合抵制標購台蕉、壓低價格的現象。1973 年菲蕉在日本市場所占比率超過台灣和厄瓜多爾，達 47.49%；從此可說菲律賓香蕉佔領了大部分日本市場，每年總占 70% 以上，1981 年（民國 70 年）更高達 91.02%，

為因應台蕉輸日的嚴峻情勢，台灣政府終於在民國六十二年宣佈實施青果合作社與蕉農訴求的「產銷一元化」，期能透過產銷合一的制度為農民帶來較高的福祉，並提高農民栽種香蕉意願，提升台蕉品質及競爭力。但實行的結果並未為台蕉帶來太大的成效，農民栽種意願降低，全國栽種香蕉面積持續的減少，收穫產量也未能



有太大起色，至 1994 年（民國 83 年）止，台灣香蕉栽種面積只有 4 千多公頃，與臺蕉的黃金時期 1967 年（民國 56 年）的 5 萬多公頃，只剩不到一成的面積，占日本外銷市場也低於 10%。為了挽救香蕉輸日的頹勢，農委會取消自 1974 年開始實施的香蕉產銷一元化出口制，開放香蕉出口權限，希望能夠改變香蕉產業長期衰微和低迷的外銷市場。香蕉產銷一元化也走入歷史，更如同宣告台灣香蕉的重要性已不復以往，回顧「剝蕉案」也成為台灣香蕉輸出從巔峰轉而衰微的轉捩，產銷政策調整也只是配合市場變化，早就失去早年青果合社訴求產銷合一，利益農民的初衷了。

看盡台灣香蕉輸日的起落興衰，引領風騷的傳奇人物吳振瑞的潮起潮落，無疑的更是一部台灣香蕉史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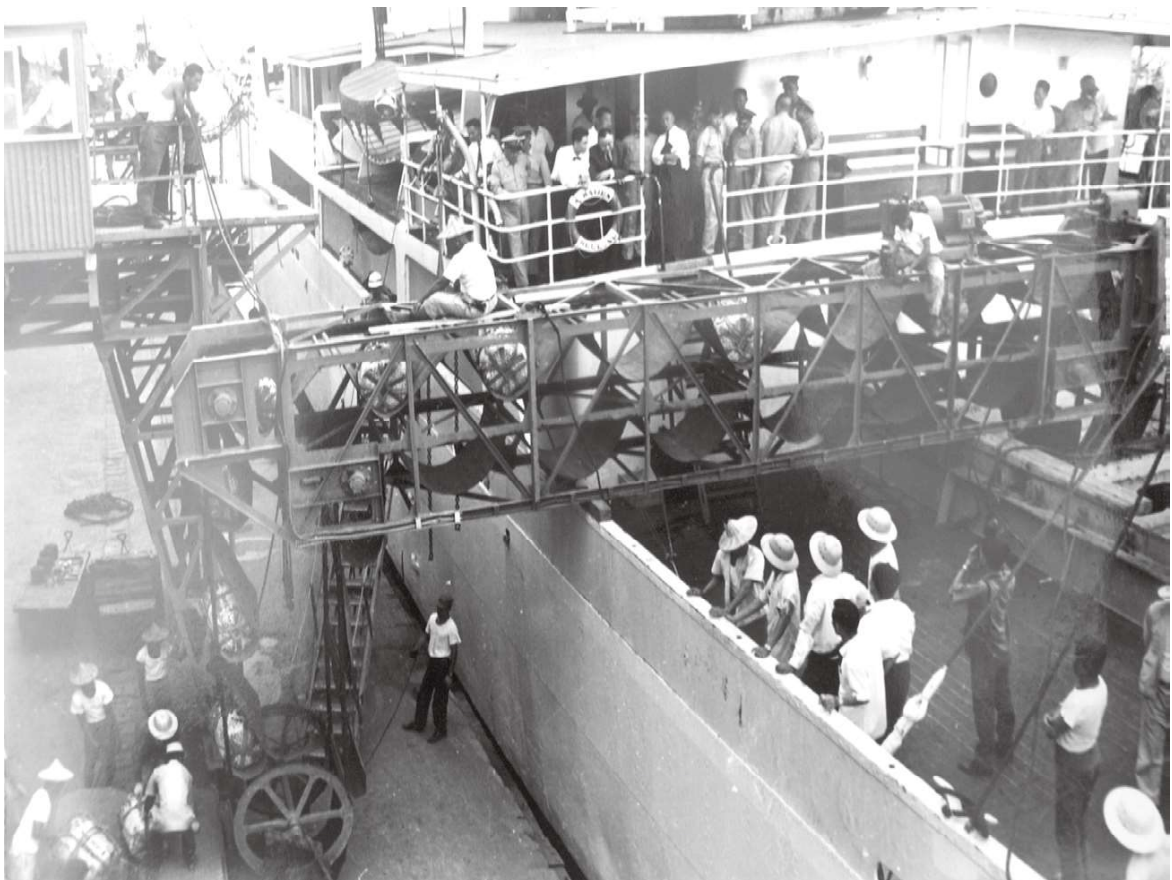
港史館退休的徐添河，在香蕉棚，訴說早期香蕉輸日的榮景。（黃旭初 攝）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提供)



當台灣香蕉以創匯領頭羊之姿風光輸日之時，倚靠人力堆疊在碼頭空地的輸日台蕉，往往會因為日曬雨淋造成品相不佳，甚至有變質腐壞之虞，於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兩層樓的「香蕉棚」便應運而生，甚至在一九六四年還進行擴建工程，這座由美援貸款挹助八百餘萬打造的「香蕉棚」，乃是委由民間「力霸鋼鐵公司」製作，下層為鋼筋混凝土樑與樓板，上層天花板則為「力霸鋼架」，同時配備「機械輸送」與照明設施。但「香蕉棚」完工之後，機件設備卻屢出狀況。原本船隻吊桿只能承載五噸起重，但棚內配備的升展裝蕉機竟重達七噸，導致機械裝蕉效率每小時不及五百簍，低於原本每小時六、七百簍的人力裝蕉。如此不堪的機件，竟還向負責香蕉輸出的青果合作社收取每筆二點四元的機件使用費。於是，



耗費不貲的「香蕉棚」最終只能淪為「遮風避雨」之所。再加上日方對香蕉品質的要求，待於五十四年六月於 31 號碼頭新建的「香蕉冷氣庫」竣工之後，「香蕉棚」便以早夭之姿，逐步退出香蕉出口的歷史舞台。現在則成為高雄港邊的觀光景點「香蕉碼頭」了。（取材自陳奕齊《打狗漫騎》前衛）

本章參考資料：

- 《打狗漫騎—高雄港史單車踏查》，陳奕齊著，前衛出版社出版
- 《山城包娜娜：旗山香蕉產業與地區發展》，莊淑姿著，麗文文化出版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十周年誌，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發行
-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十五周年誌，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發行